

略说先秦散文中的讽刺笔法

周 先 民

先秦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形成了许多特点，有些特点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散文中的讽刺笔法就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一笔法的讨论还很不充分。拙论试图从微观入手，举例对这一笔法在先秦散文中的确立及其种种表现做一个走马观花式的浏览，以期勾勒出其演进发展的大致轮廓。

先解释一下“讽刺”的含义。关于“讽”，《韩非子·八经》云：“故使之讽，讽定缉怒。”王先慎集解曰：“讽，劝谏。”陈其猷集释曰：“不以正言谓之讽。”关于“刺”，《诗经·周南关雎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郑玄笺曰：“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可见，讽刺的本义是指用譬喻或者其他非直接说出的方法劝告或讥刺。将讽刺的方法诉诸于文章即是讽刺笔法。那么，讽刺笔法在先秦散文中从初露端倪到渐成风气，呈现出怎样的具体状况呢？

一、先秦历史散文中的讽刺笔法

1、《春秋》：开讽刺笔法先河

《春秋》据传为孔子所编定，其记史，有纲无目，是最简约的大事记。其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不是直接表明，而是不动声色地通过对用字的选择让读者意会，始终贯穿着以一字寓褒贬的笔法。这字里寓贬、绵里藏针，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一种不直接说出的讽刺笔法。如《春秋·隐公元年》曰：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焉。

《公羊传》解释“克”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穀梁传》解释“段”说：“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按：甚者，大也，联系下文，意即突出、强调郑伯之恶）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可见，《春秋》曰“克”而不曰“杀”，曰“段”而不曰“弟”，都寓有深刻

的讽意，是对兄不兄的郑伯、弟不弟的段的严厉谴责。

2、《左传》、《穀梁传》、《国语》：语中藏讽，寓贬于事

《春秋》开讽刺笔法先河，寓贬于字，微言大义，可以说是“用字讽”的典范。《左传》、《穀梁传》、《国语》等史书效法春秋讽刺笔法，又更进一步，将“寓贬于字”发展而为“语中藏讽”，“寓贬于事”。这里所说的“语中藏讽”，是说通过人物语言来讽刺，“寓贬于事”是说通过事实本身来讽刺。

《穀梁传·僖公二年》记晋献公用荀息之计假道于虞以伐虢，后又灭虞之事曰：

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此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假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宫之奇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挈其妻子以奔曹。献公亡虢，五年而后举虞。虞公不懂唇亡齿寒之理，不听宫之奇之谏，贪图晋之宝玉、宝马，假道于晋以伐己之邻邦虢，结果亡国，亡国的结果正是对其贪心的绝妙讽刺。而那些宝贝呢，且看荀息如何向献公汇报：

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
“璧则犹是”，是说宝玉丝毫未损，不过让虞公免费保管了五年；“马齿加长”，是说马长大了，意即让虞公做了几年马夫。他并未正面指出虞公的愚蠢，但虞公的愚蠢却毕显无遗，讽刺是非常辛辣的。

再看《左传》的例子。《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晋秦殽之战，晋胜获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但晋侯听信夫人文嬴谗言，误放三将；后纳先轸谏，“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且听死里逃生的孟明如何答谢晋侯之恩惠：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孟明表面上说，托晋君福，免我一死，三年后将来报答晋君。实际上语中带刺，意即三年后再来报仇。这是孟明从语言上对糊涂晋君的尖锐讽刺。孟明没有食言，其后三年，《左传·文公三年》记此事结果曰：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孟明报仇成功，率军大败晋人，这一结果对放虎归山的晋君来说，不是绝大的讽刺吗？

《闵公二年》记卫懿公好鹤之事云：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荜泽，卫师败绩，遂灭卫。

《僖公二十二年》记宋楚泓之战云：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及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

以上两则例子，前者用卫懿公好鹤、宠鹤，最后因鹤而亡国的事实，嘲弄了卫懿公的昏庸；受甲人所云“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对其败因作了极富讽刺意味的交代。后者用宋公不听司马劝告，不击未济之敌而遭败绩的事实，讽刺了宋公的愚蠢。

同样的讽刺笔法在《国语》里也可以看到。《周语上》记厉王弭谤之事曰：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厉王拒邵公之谏，用暴力止谤，自以为得计，最后自食其果，身败名裂，被驱逐流放。“三年，乃流王于彘”的结果本身正是对倒行逆施、“能弭谤”者的无情讽刺！

3、《战国策》：用寓言讽

以上所述三部史书里“语中藏讽”，“寓贬于事”的例子，比之《春秋》的“寓贬于字”，显然丰富了许多。不过，它们仍然拘于记实，只是通过记言、记事来表达讽意。《战国策》则又有发展，不但有上述记实式的讽刺，而且用了虚拟的讽刺笔法，即创造寓言来进行讽刺。《战国策》里记载了许多寓言，有些寓言不但讽意深刻，而且形象生动，结构完整。下面且举两例。其一见卷九《楚策一》：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也！子以我不信，我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狐假虎威的寓言。江乙用这个寓言，一方面把昭奚恤比做假借虎威、大言欺人的狡猾狐狸，一方面又把荆宣王比做轻易受骗、智力低下的糊涂老虎，具有一箭双雕的讽刺效果。

其二见卷二十五《魏策四》：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赭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为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季梁用‘南辕北辙’的寓言，尖锐讽刺了魏王攻邯郸的愚蠢。与前例所不同的是，‘狐假虎威’的主人公是动物，是通过动物的行为来比拟所讽刺的对象；此例的主人公则是人类，是借助人物的愚行来类比所讽刺的对象。由此可见《战国策》中讽刺性寓言的多样化面貌。

以上拙论对讽刺笔法在先秦历史散文里的种种表现作了一个粗浅的介绍。可以看到，从《春秋》到《战国策》，其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春秋》的‘寓贬于字’，在用字的区别中暗示贬意，开了讽刺笔法的先河；但其篇幅非常短小，讽意也艰深难解，还不具备形象性。《左传》、《国语》等则大进了一步，将讽刺笔法发展而为‘语中藏讽’、‘寓贬于事’，使其篇幅加大了，讽意显明了，形象性也从无到有了。《战国策》又进一步，将讽刺笔法发展而为用寓言讽，出现了虚构的丰富多样的讽刺寓言，大大提高了讽刺笔法的文学水平，加强了讽刺力量，将讽刺笔法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二、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讽刺笔法

讽刺笔法绝非仅仅在先秦历史散文中蓬勃发展，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发展

得更为充分。在《论语》、《墨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论说散文中都有着生动的表现。可谓百花齐放。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1、《论语》。《论语》的体裁是语录体。其简短的问答中时有讽意显现。《卫灵公第十五》云：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季氏第十六》云：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前者是卫灵公问孔子布阵打仗问题，孔子以只懂祭祀，未学军事作答，对卫灵公的不好礼而好兵进行了讽刺，表达形式上的特点是寓讽刺于无言。后者是针对自己的学生，用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的比喻，对他们推卸责任的错误进行了讽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讽刺对象是自己的学生，所以这种讽刺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善意的帮助。而善意的讽刺正是论语对讽刺笔法的新贡献。

2、《墨子》。《墨子》亦是语录体裁，其说理，以逻辑严密的正面论证为主，但《非攻上第十七》，几乎皆由反讽构成，且录两节如下：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第一节是从杀人愈多其罪愈重的常识出发，推理出攻国杀人其罪必重的逻辑，从而尖锐地讽刺了称誉攻国杀人‘谓之义’的荒谬。第二节从‘少见黑曰黑，

多见黑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这一违背常识的荒唐可笑出发，尖锐地讽刺了知小非而不知大非，竟将‘大为非攻国’‘谓之义’的荒谬。用归谬法来进行讽刺，是墨子的特点，也是其对讽刺笔法的新发展。

3、《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是关于春秋时齐国贤相晏婴的系列小故事集，其卷六《内篇杂下》有《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辞以近市得所求讽公省刑》章，其文云：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晏子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窃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是时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而屦贱。’公愀然改容，公于是省于刑。

‘踊’是刖足者之屦，在君臣开玩笑、公问‘何贵何贱’之际，晏子针对‘公繁于刑’之背景，陡然以夸张方式答曰‘踊贵而屦贱’，讽刺景公‘繁于刑’之残酷政令，使得景公‘愀然改容’，并‘于是省于刑’。用幽默夸张的方式表达深刻的讽谏之意，是《晏子春秋》为讽刺笔法提供的新经验。

4、《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为吕不韦集门客所论而编辑成书，所论很杂，其论证说理也时有运用讽刺寓言处。比如，其《审应览第六淫辞》云：

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禪缁也。以禪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

《不苟论第四自知》云：

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

前例用丢了纺缁的澄子欲强夺穿禪缁妇人之衣的寓言，讽刺了澄子之强词夺理的荒唐可笑，从而证明了‘淫词’的危害性。后例以掩耳盗钟的寓言，讽刺了自欺欺人的荒唐可笑，从而强调了自知之明的难得。这两例都是借助讽刺性寓言来说理，而借助讽刺性寓言说理正是诸子散文运用讽刺笔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5、《孟子》。《孟子》在运用讽刺笔法说理方面有极高成就。比如《梁惠王上》用甚于缘木求鱼讽刺梁惠王用武力追求统一的危害性；《藤文公上》驳斥行反对社会分工的谬说时，通篇都用了反讽语气。不过，最能代表其讽刺笔法成就的，还是其讽刺性寓言。其文学性远胜前述的《吕氏春秋》。有些讽刺寓言，读来简直就是优秀的微型小说。其卷八《离娄章句下》有寓言云：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鬻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厌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这是一则绝妙的讽刺故事，从结构上看，开头与结尾相呼应、相对照，中间写其妻从疑心、到跟踪、到相讪、相泣，展开也很充分；从人物上看，良人在妻前的庄严自负与乞食时的可怜可卑形成尖锐的对比，生动地表现出其用装腔作势的外表来掩饰卑微内心的那种极端萎琐卑劣的性格特征。可以说，这则故事代表着先秦讽刺性寓言的最高成就。

6、《庄子》。《庄子》的文学成就在诸子中最为突出，其讽刺笔法也运用得最为广泛，诸侯王公、仁义道德、社会诸相、芸芸众生、三教九流，都逃不脱其愤世嫉俗的讽刺机锋；其说天说地、说死说生，说人说己，说敌说友，都免不了刁钻刻薄的天性流露。就讽刺寓言而言，《庄子》也是独树一帜的。其他诸子运用讽刺寓言，一般只作为论据，作为比喻，来证明文章的观点。比如前举《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在故事说完以后，还拖着一个说理的尾巴：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文章特意表明其运用上述寓言，是为了说明人求富贵利达，必须合乎正道，必须言行一致，而不能不择手段，不能表里不一之道理。这个尾巴，对于其论说文来说，也许有揭示题旨之意；但对其文学性来说，无疑是个蛇足，将丰富的形象暗示束缚住了。但《庄子》则超越了这个局限，它的许多讽刺寓言就没有这样的蛇足之累。而且，其寓言的形象奇特丰富，出人意料，诡奇多变，往往令

人击掌叫绝。如卷八《列御寇》有寓言云：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往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辘轳巷，困窘织布，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其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无一句论说语，自始至终让形象表达讽意，而且其比喻的新颖尖刻让人忍俊不禁。

卷四《秋水》基本上是用一系列寓言组成，其后半部分是两个讽刺寓言：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杆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谓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庄子鄙视官场，认为官场污浊，政治黑暗，投身做官是自投罗网，远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这两则寓言所表明的即是这一严肃的政治主张，但是，却没有一句正面说理，完全用生动的形象传达。前者通过对话，不言已欲言而让对方代言，在幽默滑稽的形式中，既嘲弄了愚蠢的对手，又明确地表明了立场。后者用辛辣尖新的比喻，在居高临下地宣布自己超凡脱俗的人生追求的同时，又无情挖苦了以惠子为代表的视官位为至宝的世人。

7、《韩非子》。作为论说文，紧紧围绕论题、层层深入论证，结论集中明确的《韩非子》在诸子散文中是最为成熟的，其在运用讽刺笔法方面，也有超越以上诸子之处。前述诸子，包括《孟子》、《庄子》在内，虽然有着大量的精彩的讽刺笔法，但它们在文章中仍然是局部的、片段的，讽刺在全文中并不占主要地位。《韩非子》则改变了这种局面。我们来看《说难》这篇论文。其文开始列举说君之难云：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

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

文章首先用排比句、对偶句从各方面提出劝说君主的种种困难和危险，似仅是客观论述，并看不出什么讽意，可是深入一想，说君如此多难多险，不正是君主反复无常，蛮不讲理吗？如果说此处的讽意还很朦胧的话，那么，文章在后面论证时所连续引用的寓言则使其讽意豁然开朗了：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已，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这是写说者所言虽当，但却无意道破君主天机而被杀，字面上固然是说说者不可不慎，但君主之专横霸道也令人不寒而栗。其文又曰：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刑。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刑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哺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啗我以余桃。’

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

这是写由于君主的爱憎之变而使弥子遭遇了宠辱之变。弥子所为只有一个，但或见贤，或加罪，字面上似在强调处境的重要，但其对君主反复无常的讽刺给人的印象更深。下面再看其结论：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这个结论将人主比做颈下长着逆鳞的龙：人触龙之逆鳞则必被杀。说者无意触到人主之逆鳞亦必被杀。至此，人主之凶恶跃然纸上了。这时再回顾其开篇提出的“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的论点，就可以恍然大悟了：知所说之心难，难就难在所说对象是人主，他们反复无常，蛮不讲理，专横残暴，说者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则性命难保。《说难》在论述“说之难”的背后，不正隐藏着讽刺暴戾人主的主旨吗！

以上拙论举例对讽刺笔法在诸子散文中的表现作了管中窥豹式的说明。总起来说，运用讽刺笔法说理明义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一个普遍现象，诸子各家都用自己的实践丰富发展了讽刺笔法，《论语》的无言之讽和善意之讽、《墨子》的反讽、《晏子春秋》的幽默形式、《吕氏春秋》的讽刺寓言都为其提供了新内容、新经验。在讽刺寓言的文学描写的优美性方面，寓言故事的完整性方面，《孟子》都有着卓越的贡献，代表着最高水平。《庄子》里的讽刺寓言则超越了只把寓言作为说理工具的局限，将其立意全部融进了寓言的形象之中，为讽刺性寓言从论说文的附庸走向独立准备了条件，在寓言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韩非子》的《说难》将讽意贯穿在全文的立意之中，可以说是诸子说理文中相对完整的讽刺之文，它为以后讽刺长文的出现提供了经验。

拙论脚步匆匆，对先秦散文中的讽刺笔法作了一次简单的巡阅，可以看到，讽刺笔法在先秦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中均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它们的合力就形成了内涵博大深厚的讽刺传统，这一传统被后代的文章家、文学家们所继承，并被不断地发扬光大下去了。笔者有意对其被发扬光大的情形继续做一番研究，不过，那将是另一篇文章了，这里就此打住。